

## 宿白先生论敦煌遗书研究始于中国

——读《敦煌七讲》

姜伯勤

姜伯勤，湖北武汉人，1938年12月生。1959年毕业于中山大学历史系，1963年中山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敦煌研究院兼职研究员，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及评议组副召集人。研究领域主要是隋唐史、敦煌学、丝绸之路史及艺术史。其有关敦煌学的论著主要有《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敦煌社会文书导论》、《敦煌艺术宗教与礼乐文明》、《中国祇教艺术史研究》等。

1962年10月，宿白先生于敦煌文物研究所主讲了《敦煌七讲》。此次讲学在常书鸿先生的促进下，由研究所李永宁、施萍婷、潘玉闪诸位记录整理，并作为《敦煌学讲座丛刊第一集》油印成册。正是这部大著，指引了我们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回顾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者在敦煌研究中的建树和路径。

宿白先生在第五讲《敦煌研究简介》中指出“敦煌遗书研究开始于中国”。宿白先生列表指出，1909年，罗振玉印行《莫高

窟秘录》，10月，发表《慧超往五天竺国传》论文；1910年，蒋斧、罗振玉合印《敦煌石窟遗书》四巨册，同年，敦煌经卷运到北京学部；1911年，罗振玉发表《太公家教》论文。

“稍晚有王国维，着重史部集部。”宿白先生讲道：

我们对敦煌石室的藏书的研究是从校勘辑佚开始的，经陈寅恪先生的倡导，才把它扩大到其他方面，这是一种新的趋势。这种新趋势一定程度上表现在向达先生的研究上，这也说明了我们的方向。

《敦煌七讲》正是继承了从罗振玉到向达先生的这一传统，开创了中国学人不仅是在遗书研究上，而且是在敦煌学的多方面作出全方位贡献的一种杰出的学术榜样，对一条正确的路径作出了宝贵的指引。

《敦煌七讲》对敦煌两千年来的历史，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第一讲《敦煌两千年》指出：“苻秦灭前凉，从荆汉一带俘虏二万人到敦煌。前凉在凉州设有译场翻译佛经”，“汉代设郡以来已六百年，出现土族庄园经济”。这种土族庄园经济到隋唐时有了变化。故云：“445窟北壁盛唐的弥勒变中画曲辕犁，有调整犁头的‘秤’。”研究表明，曲辕犁出现引起上述经济上的剧变，而敦煌壁画提供了曲辕犁出现的图像证据。

宿白先生指出：“隋唐洞窟艺术一定程度代表两京。”“张氏统治前期，和唐有信使往来。这一时期的敦煌石窟艺术很兴盛。壁画、塑像的水平都很高，这和当时敦煌与唐关系的密切有直接关系。”

第二讲《石窟寺考古学简介》指出，“石窟寺考古学是佛教考古学的一部分”。

第三讲《石窟寺研究的业务基础知识》，首先指出要关注艺术史，关注郑昶、俞剑华、王逊等美术史家的业绩。又要关注佛教史，关注汤用彤、法尊、吕澂、陈垣诸位先生的工作，关注常盘大定、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诸氏的工作，还介绍了日本刻本

《释氏六帖》。

第四讲《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是分量极重的一章，其中子目有：（一）索靖题壁问题。（二）从乐傅、法良所联想到的问题。（三）试论敦煌魏隋窟的性质。（四）唐窟性质的逐渐变化。（本节子目又有：1.贞观一天宝时期流行的净土变相。其中指出：“自初唐至天宝时期各种净土在石窟内流行，说明了石窟性质逐渐从单一的僧人的禅观，转化为除禅观以外，还要有延寿祛病的作用。少数观音变的出现也是同样的道理。”2.大历以后壁画题材复杂化。高宗时代，道宣提出定慧双修，在道宣影响下，僧人除了坐禅念佛之外，注意读经。又因“舍宅为寺”，“建为家庙”，而集资建窟，通过当时流行的社邑来组织。）（五）密宗遗迹及其他。（本节子目又有：1.唐代密宗遗迹。2.曹氏、西夏时代的密宗遗迹及有关问题。）

第五讲《敦煌研究简介》，提出“敦煌石室藏书的研究与敦煌石窟研究相结合”，“考古学要求注意遗迹遗物的内在关系”。

第六讲《石窟记录与排年》。

第七讲《佛像的实测和造像度量经》。

《敦煌七讲》在研究方法上给不止一代的学人以启迪。如第四讲《有关敦煌石窟的几个问题》，其中有“试论敦煌隋窟的性质”，指出：“从十六国到隋，石窟的性质主要是为了坐禅观相。”“初唐以来，佛教流行净土……坐禅风气一时未息。”“小窟坐禅大窟观佛，中心塔柱窟是为了‘入塔再观’。”唐窟的性质逐渐变化。

宿白先生的这些论断，有充分的佛典根据，如《坐禅三昧经》、《禅秘要法经》等。当时僧人坐窟行禅，观佛生身相、法身相，观七佛，观释迦多宝并坐像，观弥勒佛等。由此对敦煌石窟的功能作了透彻的说明。

敦煌研究院贺世哲先生新著《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中指出：“很幸运，1962年10月，我有机会聆听北京大学宿

白先生的《敦煌七讲》，受益终身。其中我最感兴趣的是第四讲……至今都有指导意义。对于北朝石窟盛行千佛、佛传、本生、因缘图像的原因，宿先生指出要从北朝石窟的性质——坐禅观像探讨。”“我至今还珍藏一份《敦煌七讲》打印稿……我常翻阅，温故知新。”又说：“宿先生在每一讲后面还开列了主要参考文献。我花了两三年的业余时间，反复阅读了当时能够找到的参考文献。”<sup>①</sup>笔者于1978年至1980年在唐长孺先生主持的国家文物局吐鲁番文书整理小组忝陪末座，1980年秋整理小组成员得以到敦煌考察学习。由于段文杰、贺世哲、施萍婷、樊锦诗诸先生的推介，我在史苇湘先生主持的敦煌资料室里抄录了一份《敦煌七讲》珍藏，并多次反复阅读，对所开列的参考书也在数年间通读。

《敦煌七讲》体现了一种大家风范，这部大作使我认识到，研究敦煌文书必须与敦煌石窟的研究结合起来，在文书学的研究中，要借鉴考古学中的年代学、类型学，对文书作断代研究。《敦煌七讲》还具体提出了许多研究者应该着力回答的问题。如第五讲《石窟考古学简介》中提到：“敦煌原有许多寺，这些寺在哪里都是问号，弄清这些，应作为研究所将来重要的工作内容之一。”在此启发下，笔者在《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一书中作了当时力所能及的讨论。<sup>②</sup>《敦煌七讲》中又高度评价了向达先生，向达先生是中外交通史的大学者。笔者有幸于1964年3月29日研究生刚刚毕业时担任向达教授在中山大学作《敦煌学六十年》演讲的记录。笔者在《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一书中，第五章论及粟特人<sup>③</sup>，就是受到向达先生、宿白先生、马雍先生、池田温先生等诸位先生的启迪。宿白先生在研究新疆的论文中提到苏联学者对粟特的关注，这也都启发了笔者此后对粟特艺术史的研究。

由于我手抄了一份《敦煌七讲》反复阅读，这就促使我对学术、对卓越的学术前辈，保持一种敬畏之心，并自觉地和各种学

术泡沫划清界限。以一斑而窥全豹，以《敦煌七讲》之一斑，得以窥见前辈中国敦煌学研究大家的学养和风范。

---

**注释：**

①贺世哲：《敦煌图像研究——十六国北朝卷》，甘肃教育出版社，2006年，“前言”第1~2页。

②参见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中华书局，1987年）第143~145页。

③姜伯勤：《敦煌吐鲁番文书与丝绸之路》，文物出版社，1994年，第150~263页。